

百年回望 1913：民国的政治轨道，在这里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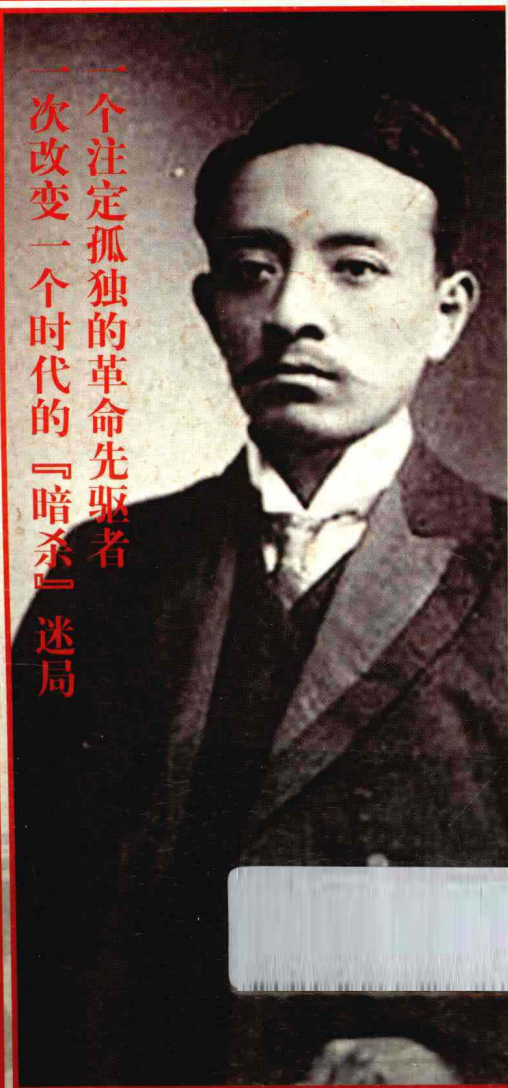
民国的开端

宋教仁评传



张晓波 著

一个注定孤独的革命先驱者
一次改变一个时代的『暗杀』迷局



光明日报出版社

张
晓
波
著

民 国 的 开 端

——
宋
教
仁
评
传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张晓波著.--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112-3554-1

I. ①民… II. ①张… III. ①宋教仁 (1882 ~ 1913)
—评传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90044号

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

著 者: 张晓波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杜 星 朱 然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龍馬精神書裝

责任印制: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31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hs@gmw.cn zhuranmuc@126.com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34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3554-1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自序 /1

引子 /5

第一章 帮会、政客与民初政治百态

——再探 1913 年宋教仁遇刺案真相 /15

沪宁车站 /19

谁是刺客？谁是主谋？ /24

“密电” /35

“毁宋勋位” /41

政客与政治 /46

若隐若现袁世凯 /53

宋案中人的结局 /57

第二章 宋教仁早年：1882—1904 /61

晚清湖南之崛起 /64

宋教仁之家世 /67

漳江书院之求学 /74

初历革命风潮 /78

种族革命思想 /82

第三章 同盟会合与分 /87

宋教仁在日本 /89

对日本的观感 /94

成立同盟会 /98

同盟会之纷争 /104

东北之行与间岛问题 /110

第四章 革命内部的领导权争夺 /117

缺乏领袖的革命 /118

黎元洪的意外与不意外 /123

中部同盟会的决策与失策 /129

湖北革命与长江革命 /132

武昌，或者南京 /138

宁沪“大元帅”之争 /143

内阁制与总统制 /149

辛亥期间的宪法文本 /157

第五章 惰性军政集团开始形成

——北洋军阀的 1911—1913 /165

历史的疑问 /168

失去士绅的满洲亲贵 /171

政权让渡 /176

共和交换 /183

惰性军政集团的生成 /188

惰性军政集团的束缚 /192

乱源 /198

第六章 民初的政治，难产的平衡 /201

民初的议会与政党政治 /203

民初的政党格局 /209

民初三大党派 /212

难产的平衡：唐绍仪、陆征祥两届短命内阁 /216

尾声 未完成的政治 /227

附言 宋教仁的家庭 /231

参考书目与文献 /236

自序

宋教仁：观测清末民初政治变动的杠杆

我和近代史发生最直接的写作关系，是在 2010 年参与新京报辛亥百人项目的写作与编辑。

从 2011 年初至 10 月，辛亥系列，我参与写作了 16 篇，19 人（其中有 3 篇涵盖两人）。之前，我对宋教仁只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远不如对北洋军阀熟悉。这当然是有原因的。辛亥年间的革命家，除章太炎之外，大抵我都认为很“无趣”。无趣的原因，其一，革命者往往陷于“理论”攻伐，纸上往来。没兵没将，纸上打仗，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其二，辛亥前十余次规模不等的革命，大抵行事不密、预备不周，旋起旋灭，没有形成可观的影响力。历史叙述，往往赋予后来的成功者更多光环，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总的来说，辛亥年革命的成功，与之前同盟会运动革命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刻内因，仍是值得深入分析的；其三，从个人角度来说，革命者的事迹（除领袖人物之外），往往较为缺乏。

之前看革命者传记，托洛茨基的传记（《先知三部曲》）引人入胜，伊萨克·多伊彻文笔才情实在很好，这本书翻译的也好，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托洛茨基很“有趣”，惊天动地、轰轰烈烈之事不胜枚举。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不太乐意看近代革命家的文章与传记。大概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著作行文枯燥琐碎，结论过于鲜明强硬，当然，也就谈不上“有趣”。

关于宋教仁，一个很直观的印象，我认为宋教仁是较为无趣的。尽管宋氏在

民国开国史中位置相当重要，不过，除了宋氏遇刺，都不算是跌宕起伏，命运似过山车的人物。这一点印象，直到我写完这本书，仍没有多大改变。这是我一开始就应该说明的，原因不外乎几点。

其一，宋教仁是较为重“理论”的。这不是说宋教仁的行动能力不强，而是说他应该是辛亥年间革命者队伍中对于国家理论讨论得最多的成员之一。也正是这个原因，宋在革命前后反而有一个位置的突变。革命之前，他在同盟会领导层中的位置，相对靠后，而革命之后，宋教仁作为新型政治人才，凸显了出来。这和同盟会成员的理论水平与组织能力，是有相当关系的。章太炎辛亥年品评诸位人物，认为宋氏堪有宰辅之才，诚如斯言。

其二，宋教仁在辛亥革命这个群体中，显得太年轻。宋教仁死之年，也不过三十岁出头。这个短暂的年龄段，是难出什么“故事”的。这不是说宋教仁无事可记，而是说他太年轻，资历与经验上显然有所不足。很多同盟会早期的重大事件，宋教仁都不是主角，他只是这个群像中的一员。怎么把他从革命队伍中抽离出来，又放回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三，宋教仁是高度政治化，也相当严肃的。相比于有些革命者，宋教仁看起来在生活一端的事情，就少了许多。翻遍宋氏短暂的人生，大概在私生活一端，要找些有趣（或出格）的事情，是很难的。如在北京期间，所谓包养妓女之事，不过是攻击者的造谣罢了。

所以相对来说，用传记这个体例来描述民国初期的政治生态，军阀是比较容易操作的。因为军阀有独有的活动空间（地域），有相当的独立性（军队），且政治观点上需要讨论的比较少（保守性）。更为重要的是，军阀兴起，往往与操弄武力有莫大关系，武力，意味着战争或者破坏，这就有了足够的“故事”。“故事”体例，本不是我喜好，也非我所长。由此，我把这段历史的讲述，调整到以宋教仁为中心的革命史与政治史之中。

本书的中心人物为宋教仁。与之相关的部分人物，比如黄兴、孙中山、袁世凯、唐绍仪、赵秉钧等等，都有涉及。在处理这一复杂的人脉网络关系之时，我不得不做了很大的裁剪，这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作者对这一时代人物理解

及其复杂的关系，难有十分透彻的把握，尽可能做到以最准确的事实叙述这些复杂的关系；其次，过于琐碎的人物细节，会使阅读支离破碎，似无必要，取其大者也可。

在我看来，宋教仁在本书中，是一个杠杆，以他来撬动对整个时代的看法。到底是个人传记，还是时代群像，在最初几个章节的写作中，我始终摇摆于两者之间。最后我决定放弃受拘泥的“形式”。对于从事历史写作的作者来说，他首先的任务，是将事情本身讲清楚。而事情，是由各种各样的人事关系、社会关系组织在一起的，同时也是受制于这些关系的，单一的人，并不能组织起这些事件，也更不可能为这些事件承担结果。由此，本书中的一部分章节，看起来反倒是一种宏观的叙述。比如，我在叙述宋教仁在辛亥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时，认为他始终是革命中穿针引线的人物，他经历了诸多革命中最重要的政治斗争，却始终不是这些政治斗争的主导者；他有他个人的政见与策略，却难以将这些构想付诸实施，唯一一次胜利，是《临时约法》的制定，这部约法是符合他关于责任内阁制构想的。他在1912年临时政府组织前后，一再强调责任内阁，甚至与孙中山发生冲突。但这部强调责任内阁的《临时约法》的制定者，仍不是他，而是临时参议院。制定约法的目的，也是临时性地“因人作法”，为了遏制袁世凯。宋教仁活动最频繁、也最能体现他政治构想的时期，是1912年下半年至1913年初，但不幸的是，当他即将北上规划大政之际，他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了。宋教仁在辛亥年前后的位置，是相当重要的，但尴尬之处在于，他似乎始终不能把握住政治运动的节拍，这不是他一人的尴尬，而是整个同盟会在辛亥年前后的困境。

值得说明的是，在宋教仁研究领域，已有不少前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书引用、参考了他们的成果，在此表示感谢。吴相湘的《宋教仁传》，资料翔实，用宏取精，予人启发。迟云飞关于宋教仁的一系列研究，对于本书部分章节的写作，有巨大的启发意义。他在缜密考证之上，对宋教仁生平几个重大问题与事件，做出了相当精辟的论述。尽管我在个别论点上对迟云飞先生持有异议，但我相信，迟云飞先生的研究工作及其成绩，至今仍是关于宋教仁研究最重要的部分。

本书的第一章，回顾了宋教仁遇刺案。这一案件，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一章中，我将重心放入到南北各种人物关系与密电的分析之上，试图重新解析宋案发生的缘由、刺客、主谋等等。我的基本看法是，刺宋一案，北洋政府有责，袁世凯或为默许，但未必是下达指示之人。

本书的第二章与第三章，涉及宋教仁早年及留日生平。主旨是讨论宋教仁革命思想的形成、人际关系、思想转变及投身革命的一些情况。

全书的中心，我认为当属辛亥革命期间，也就是1911年10月至1912年2月。在这个时间段内，形势变化万千，各种力量纷纷涌现。所以，我特别插入一个与本书似乎并不吻合的章节——《惰性军政集团开始形成》，其用意，是分析北洋军阀在民初的崛起及其政治面貌。在我看来，这是相当有必要的，它不仅是宋教仁生平斗争的背景，也是辛亥革命中的一个中心环节。正是这个军事集团突入到辛亥年的政治格局之中，才产生了之后一系列的重大政治事件，包括宋教仁之死与二次革命。

本书的最后部分，涉及短短一年的民初政党政治及其成败。这或许是本书最为复杂的部分，它关涉到方方面面的政治人物与政治社团在民初的角逐。我认为，这一政治形式失败的根源，还是埋藏在辛亥革命之中。革命释放了一个强力军事集团，它随时可以撕破面具，以一种激烈的方式中断议会政党政治的实行。对于北洋集团来说，它不过是在选择一个时机。这似乎又回到了本书第一章的命题，也就是关于宋教仁遇刺的讨论。

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作者对于民初问题讨论的结束，而是一个开始。这些不成熟的讨论，期待日后更进一步的深入辨析，也需要通过另一种形式来加以阐明。

引子

一、晚清七十年之趋向

清王朝的最后七十年，是大势所趋、被动变革的七十年，也是酝酿革命的七十年，封建制度眼看着要走到尽头，在偌大清帝国版图的下面，是革命力量的暗流涌动，西方思想、技术的不断渗透，使得清王朝已经无力继续前行。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的失败，使得数千年封建体制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用一种新制度重新设计权力运行方式，进入了新一代知识分子思考。

或许，费心寻找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总是懒人的办法。王朝崩溃，问题总是层层累积，乃至积重难返。清季的结症何在？清王朝在最后七十年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在自改革乏力之外，就是民族问题。导致清帝国最终走向覆灭的，正是民族问题与改革问题互相激荡，互相逼迫。

改革本不是问题，但是一再延后，一再将权力集中在一个小集团（满洲权贵）手中，就成了问题。在撞上洋枪洋炮、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之后，改革就提上了日程。但是改革的进展却始终有限。1840年以前，官员严重腐坏、卖官鬻爵、白银外流，清王朝已经面临严重的政治问题。龚自珍在道光年间呼吁改革，是清王朝士绅阶层中较为开明的部分要求自身改革的初始。龚自珍的倡议，是要求朝廷进行人事改革，还没上升到体制改革的高度，也不可能上升到这一高度。总体来说，清嘉庆、道光两朝所遭遇的政治危机，与传统王朝政治走入稗政的死胡同

同，有一定的相似性，清王朝面临的，还不是近代的政治挑战。

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改革诉求，就进入体制阶段了。从军事角度来看，1840—1870 年对清王朝的重大军事挑战，导致的必然结果，是王朝在军事装备上不断向西方学习，不断地现代化。与之相应的，是各地在国家推动下，开始进行军事工业建设。从外交角度来看，为应对新的天下格局，中央对外体制也进行了改革，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衙门，实际上是从清中前期的理藩院或礼部分离出去的自成一体的部门，随着对外关系的不断加强，它的重要性也不断提高。与军事体制改革、中央机构分化相应的，是部分教育做了现代化改革。这项改革主要是派遣留学生向海外求学、设立翻译馆等等。教育改革的推动者，主要为手握实权的湘淮系领导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等。

甲午之战，陆军一溃千里，海军沉于黄海。军事一再失败，提出的新命题，即是政治体制转型不够，仅仅购置西方的武器、开办一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远不能应对晚清遭遇的危局，全盘体制改命题，也就是随之提上了日程。1898 年，戊戌维新因帝后两党在权力配置、改革进度等问题的分歧与斗争中，遭遇失败。此后，是 1898—1900 年的蹉跎，这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时期。庚子事变，再次打压了国内保守派势力，“改革”再次成为主题。这也就有了清亡之前十年的废除科举、预备立宪、改组内阁等等举措，从形式上看相当“激进”且“现代”。但总体来看，清王朝最后十年的改革，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进展有限，始终处在试探性阶段，伸出一条胳膊，又缩了回去，没有摸着石头，更不想过河。

那么，改革乏力的根源是什么，已经有很多论述对这些问题进行过繁复的讨论了。这些论述，从财政匮乏、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乃至复杂的人事较量等方面，论证清王朝自我改革的乏力。在此，我仅概述两个政治上的根本动因：其一，为清王朝政教文化体系的“完善”，其二，是少数族裔统治多数民族转型现代国家的“民族难题”。

清王朝政教文化体系的中枢环节，为科举制。作为帝国选拔官员机制核心的

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选官制度，与中国中古王朝推行的举孝廉等制度一样，它同样具备维系帝国各个层面的功能，从中央官员到地方士绅，都能在这个体系中找到稳定的位置。并且，它通过制度性的安排，使得士绅具备了对底层民众的文化、政治领导权。在这里，科举制是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设计，从唐宋至明清，科举历行千年而不废，也足以说明，难有新的机制出来与科举相对抗，甚或对科举加以补充。

从政治的实际功效来看，科举制提供了上下层级之间的有效联系，缓解王朝政治中单一的行政与受政之间的冲突，甚至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创造行政两端（政令制定者与被动执行者）之间的平衡。如果没有遭遇冲击，就科举制对保护社会的稳定性来说，它是相当有效的。同样，这套科举体系也有过于呆板甚至僵化的一面。制度定出来了，多少年一考，取得何等样功名，再往前走，亦步亦趋。相对公平的考试制度，能选拔出合格的文职官员，是其基本前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科举未必能选拔出优秀且富于创新能力的官员，这是制度与人之间的困惑，这不是清王朝一朝的问题，明王朝末期同样也在遭遇这层尴尬。或许，今天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将来也会面临这种困惑。但总体来看，科举制的运转，是王朝稳定的最大保障，它不至于使得人才没有出路，而另寻捷径，更不至于使士绅因上进之途中断，而与王朝产生对抗与排斥情绪。

1905年废科举，没有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由于清王朝在废除科举之后很快灭亡，长期效应没有显现出来。但就短期来说，清王朝覆灭之际，士绅为主体的立宪派普遍站到了革命党一边，与废科举之后士绅进身之阶的中断不能说没有关系。从长期来看，短暂的民国，也为废科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民国的用人机制，一直处于紊乱状态，或亲信，或乡里，或党徒，或武人，总之它没有办法重新组织起一套新的人才选拔机制。另一个负面结果，是随着清王朝的崩溃，因文官体系被打断，政权为武人所获。武夫当政，议会政治始终建立不起来，这对前清文官为主导的体制，是一个颠覆性局面，也是自元朝以来，八百年间中国唯一一段武夫当权的短期历史。

在讨论了科举的积极作用之后，我们也需要看到它在稳定机制中的负面效

应。以科举为中心的稳固的政治体系，也让清王朝的改革举步维艰。清季改革的反对派，文章做得好，清议呼声高的，都是科举出来的人物。反倒是考试不怎么在行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对改革很有兴趣。要改革，变更祖制，在人事层面，是革新用人机制，裁汰一大批由科举选官选拔的中庸官员；在制度层面，是打破王朝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有效联系，使由科举制组织的社会进一步解体；在文化层面，是儒家文化政治体系赖以生存的社会机制被破坏。这是清末改革所要付出的代价。代价太高，反对者呼声更高，也就不难理解了。

就中央政治体制来说，清王朝的基本架构，是延续明王朝的九部内阁制。但也有不同，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九部各有满汉两套班子，满班为首，汉班为次，这是清王朝的基本权力分配。原本的权力中枢内阁，在雍正朝之后逐渐边缘化，秘书班子军机处取而代之。内阁在明，有票拟权，而雍正朝之后，它成为享清誉的荣誉部门，类似于清亡之际的弼德院（清末仿日本枢密院新设立的国务顾问机关）。

军机处这套班子，是纯粹的皇帝顾问咨询机构，不折不扣的“捉笔奴才”。历史存在很多偶然，“捉笔奴才”在清代，没有出权臣，这份偶然的背后，与帝王家族没有出一系列的废材有关，更与清代的制度设计有关。军机能不能成为重臣，他首先要获得皇帝（或者皇室的代表——如慈禧）的信任，而不仅仅是职位上的重要。

清王朝政治体系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满汉平衡。清王朝以少数族裔入主中原，经历了残酷的征服战争。依仗武力（八旗以及后来的绿营）为基础，以少数族裔统治多数民族，也由此使得清王朝的满汉平衡问题，始终是摆在执政者头上的利刃。平衡一旦被打破，政局就陷入动荡之中。更因为中国传统王朝，基于文化上的先进性，天然排斥“低级”的“夷狄”进犯中原，乃至统治中原。由此，清王朝要建立其合法性，就不得不吸纳明王朝的政治运作机制，包括维系上下两端的科举制。它同样需要在文化上为自己论证，如果没有办法说服中原士子，那么就只有通过文字狱残酷镇压。

清进入中叶全盛之期后，在政治上荡平了分裂势力，建立起了平衡且有效的中央至地方的政治机构，但在自我合法性的论述上，它仍捉襟见肘。雍正以《大

义觉迷录》宣布天下，但对政治合法性的论述，亦无计可施，只得借治理之效，以表彰清王朝：

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义存心。若僻处深山旷野之夷狄、番苗，不识纲维，不知礼法，蠢然漠然，或可加之以禽兽无异之名。至于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而喀等，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诈之习，有熙皞宁静之风。此安得以禽兽目之乎！若夫本朝，自关外创业以来，存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即古昔之贤君令主，亦罕能与我朝伦比。且自入中国，已八十余年。数猷布教，礼乐昌明，政事文学之盛，灿然备举，而犹得谓为异类禽兽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宁在地之内外哉！^①

少数族裔统治多数族裔的政权合法性问题，在承平盛世，确实能通过有效的治理，将这些问题压制下去，但只要清王朝的政治治理不再延续前期的盛平之世，或者遭遇外部世界的冲击，民族问题马上就会再次显现。1840年之后，随着清王朝治理能力减弱、外部挑战日益加重，民族问题马上也成了重中之重，先有太平天国，后有捻军，然后再接续以革命党，直至覆亡。族裔之间的矛盾，总是与政治、社会上权力分配息息相关，一旦政权变得不再稳固，那么族裔之间的冲突，就凸显了出来。

如何重构清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在清季，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 20 年间，是清王朝面临的重大难题。困难在于，清王朝必须要完成从帝国转向民族国家的政法文化体系，以使其能与欧洲列强接轨。但转化本身，蕴含着的悖论是，清王朝统治者本身即是少数民族。

如果这个朝向民族国家，以西欧（德）为模板转化完成，那么清王朝统治者

① 《“大义觉迷”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9 页。

的合法性本身也将从儒家建构的政法文明体系中剥离。这是 1908 年之后皇族收紧权力的根源。恐惧失去权力，甚至失去身家性命，使得一部分在政治上不成熟的皇族成员收紧权力，以求保全。

1908 年之后，满汉平衡在表面上似乎仍在维系下去。汉臣成为封疆大吏，独挡一面，不在少数。但在这个“趋势”上，1908 年之后年轻的皇族成员控制的中央政局，以及随后出现的皇族内阁，毫无疑问是对满汉平衡的反对。这种来自上层的反对，同样也推动了汉族士绅阶层与王朝之间的离心离德。

清王朝的改革，总显得不情不愿，尤其在触动其统治权的时候，更显紧张。或出于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天然恐惧，或出于政法文教体系的完善。及至 1911 年清王朝垮台，改革仍在“准备”之中。直至袁世凯反攻倒算，才打算更张。不过，为时已晚。

同样，在风雨飘摇的清季，民间关于旧汉族王朝的记忆，也在不断复活。从太平天国到革命党人，不断地在理论与历史记忆的层面复活关于汉族王朝的历史，同时将清征服史中最为血腥的部分加以宣传，以加强被征服民族的屈辱感。如关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历史记述，不断在日本翻印，并为留学生所重。它突出的功效，也在于加强族裔的历史仇恨和现实对立。在本书中，我讨论了宋教仁早期民族主义之发生与加强，显然邹容、陈天华的《革命军》、《警世钟》等带有浓烈民族主义的著述，对其影响是巨大的。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如果清王朝是汉族正统王朝，那么中国在 20 世纪初的命运，究竟会如何？是走向日德的实君立宪、英国的虚君立宪，还是美式共和革命？

这只能是猜测，历史不能翻转。我们所知的结局是，在一个偶然的时间点，一个北方民族充当了一个大国执政者的角色，在一系列变革之后，终于被推翻了。

二、革命的来临

1911年大革命成功，引出的问题是，革命朝向何方。这其实可以从革命之前的一些辩论中寻出端倪。

传统中国，关于王朝更替的理论，只有禅让与征诛两种，别无他法。赵翼《廿二史札记》谓：

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祚。然周公未尝有天下也。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①

通过暴力手段，改朝换代，是为征诛。它首先要论证清王朝为一个不合法的王朝。否则，即为乱臣贼子。

“革命”一词，出自《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它在“周易”的意思，是革除商之天命。在此，它是为周王朝置换商王朝的暴力提供合法性论述。于此，也就产生了对于“革命”的重新论述。从文献来看，首倡革命的，是孙中山。冯自由《革命逸史》，首谈革命“二字”之来历，称在清季乙未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兴中会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尚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革命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词。1895年9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中山、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为“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

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禅代”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